



败；进而在根本上重新去思考体育对于人的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本来意义，重新去构建未来符合中国国情、适应国民需求的体育发展之路。

正是基于如此的思考，上海大学在伦敦奥运会闭幕不久，即举办了题为“伦敦奥运后中国体育的走向”的学术论坛，并与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联合组织了本期的专题研究，聊以欣慰的是，这一倡议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

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前司长谢琼桓先生在“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新视野”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在此前引起极大学术影响的“论北京奥运后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并运用历史辩证的方法，提示人们不仅需要历史的眼光去评价过去，而且更应该从容地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今天，规划未来的体育发展。

北京体育大学任海教授在题为“发展三大球，促进体育体制改革”的专稿中，首先全面评述了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奥运军团的种种典型现象，随后系统地阐述了如何通过发展足篮排三大球，以突破在现行体育制度下的发展瓶颈，真正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双轮驱动，从而将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与社会自发萌动的自下而上的力量结合起来。

清华大学仇军教授在论坛发言的基础上，形成了“伦敦奥运会后中国体育走向何方？”的文章。该文基于国际体育比较的视角，同时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基础，通过对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属性、功能和发展特征的分析论证，得到了“强政府发展竞技体育、强社会发展大众体育”的基本结论。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顾骏教授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以社会学家所特有的思考方式，辨析了在我国体育发展中的“国家和国民”、“国家和运动员”、“中国与世界”等三大关系，并对镶嵌于其中深刻的社会意蕴做出了解读。全文词锋锐利、观点鲜明，足以发人深省。

成都体育学院卢锋教授的“中国体育发展方向猜想”，就其内容而言，绝非是一种凭空猜测，而是基于科学的实证方法，对奥运会举办国体育发展的后续效应以及我国体育运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趋向等问题，进行了论之有据、持之有理的分析和讨论。

上海体育学院徐本立教授在“我国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若干问题”论文中，则根据他自身多年来对于中国竞技体育发展问题的研究心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逐步向以社会化为主的混合型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过渡”、“通过购买服务淡化国家职能，加大社会职能”等主要研究观点。

综观上述研究，虽然存在研究视角上及其在问题意识本身等方面的差异，但就各自的研究立场而言，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具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中国体育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变革创新的有利时机，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自信，可以也应该从容地用一种崭新的思维去运筹帷幄，开辟未来更为健全的体育发展之路。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新视野

谢琼桓（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北京）



作者简介：谢琼桓，1994年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在原国家体委和体育总局先后出任理论处处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学会办公室主任，政策法规司司长。兼任中国体育发展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奥委会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协会五届全委会委员。出版《五环夜话》、《守望体坛》两书。主持或参与近20年来国家体育总局重要文件的起草，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以及《体育改革及发展纲要》。发表评论和论文几十篇。主持国家社科课题《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New Viewpoint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

关键词：伦敦奥运会；中国；竞技体育；发展 Key words: London Olympic Games; China;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就竞技体育而言，伦敦奥运会进一步确立了我国在世界体坛的前列地位，我们已经强大到能够承受为了今后体育更加全面、更加健康、更加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进行改革所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强大到能够经受奥运成绩在第一集团内升降起落。

今后面对奥运会，我们不应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相反，我们会从容淡定，不亢不卑，放松自如参与各种活动。总之一句话，我们会处之泰然。偶尔也可来点我行我素。当然，我们不要傲慢，更不要将赛场上的胜负作不必要的引申。我们会渐渐学会在“压力”“残酷”“雪耻”“报一箭之仇”的赛场语汇中，找到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



另一种新感觉。

二

三大球在伦敦奥运会上的整体低迷必定会引起人们的思考,因为,三大球观赏性强,有商业价值,是体育商业化、职业化探索的首选,也是拥有最多爱好者的项目。这3个项目不只是4年一次在奥运会才崭露头角,它平常就是活跃社会生活、制造吸引“粉丝”的重要手段。所以,决策部门不会听任其继续低迷下去,而是会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三大球滑坡。毋庸讳言,长期以金牌为取向的竞技体育,对于球类项目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特点的研究、掌控不够用力,起码是缺乏耐心。但同时也应该承认,三大球在世界上普及面广,特别是西方国家运动水平高,想在这方面争金夺银难度大。伦敦奥运会后,迟早会对篮球、足球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为什么市场化探索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今后怎么办?无非两种选择,要么按照商业化、职业化基本规律去闯一闯,要么回到传统的做法上去。用杂交的办法、张冠李戴的办法看起来行不通,只能做出一锅夹生饭。不过,实事求是、取长补短、取精用弘总是需要的。足球篮球在我国是爱好者最多也最有商业价值的项,找到一种合适的体制机制,改善训练方法、提高训练水平不只是为了奥运会拿牌,它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好处,对公众的诉求也是一种回应。

三

伦敦奥运会我国代表团遇到不少问题,遭遇误判,遭遇误解,这是转型时期的阵痛,成长中的烦恼。如同国际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接纳中国的崛起,同样,国际体育界似乎也没有准备好中国体育的崛起。我们必须逐渐学会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体育大国,“宰相肚里好撑船”,必须逐渐学会应对“高处不胜寒”的状态。今后在赛场上我们会更加宽容,但又不刻意压抑个性,不害怕发出自己的声音。社会舆论会更加成熟起来,不会动不动上纲上线,以偏概全,使得运动员动辄得咎。丁宁本来经常战胜李晓霞,突然那么不顺,裁判判罚又使她不能接受,于是眼泪夺眶而出,甚至向裁判提出质疑。要在极左时代,大批判起来一箩筐,振振有辞。但这一回,很少人出来指责。一个小姑娘,在这种情况下有点情绪,也是人之常情,不必苛责。别有用心的称中国运动员为“机器人”,他们对于组织纪律、对于责任感使命感曲意解释,我们不必在意,但是在行为举止上少些刻板僵化、多些真情实感总是讨人欢喜的。在哲学词汇中的真善美,真是排在前头的。我相信今后我国运动员会更加自由自在地表情达意。只要无碍大局,喜怒哀乐自自然然流露出来没有什么不好。

四

包括乔良在内的中国教练在外执教所取得的成绩成为伦敦奥运会的一道亮丽风景,体育界内外对这道风景持积极性评价。回想当年有些乒乓球教练和运动员出国执教打球遭到

舆论抨击,不难体会到国人体育理念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不难体会到中国体育拥有了更多的自信。有人说,在乔良指导下的美国运动员得了金牌,它所产生的国际积极影响不比中国运动员自己拿金牌差多少。

的确,回想当年各省市为了全运会削弱对手的力量,互相封闭,教练和运动员不许跨省市流动。再看今日的景象真是恍如隔世。我相信今后人们会习惯于全球化背景下教练员运动员的世界性流动,也就是说,我们会以开放的态度看待和处理此类问题。我甚至认为,如果我们能将自己的优势项目通过教练员运动员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国,那是对世界体育的一种更大更值得称颂的贡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的国际化合作已经形成一种潮流,并正在以不可逆转之势向前推进。这股潮流冲击传统的体育理念,给体育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更为广阔的新天地。

五

伦敦奥运会的经验教训都会给我们以启示,人们会拿它与北京奥运会进行比较,从而更加全面、更加客观地理解赛事东道主的职责,对国内的各种赛事东道主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我觉得像英国这样的老牌帝国,它不是没有条件、没有能力把奥运会办得风生水起、玉润珠圆,而是英国人根本没有像我们那样把举办奥运会当做一件大事来抓,更不必说举全国之力、举全市之力。有记者报道说,充其量举伦敦东区之力。英国人开初七嘴八舌,不给伦敦市长面子,市长也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后来,市民还是识大体顾大局,各个赛场包括山地自行车赛场,都到了不少观众。说明自由也不同于一盘散沙,有别于各行其是。说归说,关键时刻还是要像个东道主的样子。再有,说是伦敦的场馆不少是临建,赛后有的已经开拆零卖。在这个世界,英国人的腰包算是鼓的,何至于如此抠门,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值得研究。我有时这么想,一个三口之家,突然要接待一百个客人吃住16天,16天后客人走了,为客人准备的宿舍和锅碗瓢盆怎么办,这不能不说是个大问题。这是常识,没有什么高深学问。大型赛事也一样,为赛事准备的设施赛后怎么处理,终究是个问题,你承认它公开它,它在那里;不承认不公开,它也在哪里。

过去,我们没有举办过世界性大型运动会,对此没有切身体会。北京奥运后就不一样了,对伦敦的一些舆论、一些做法也就不难理解。我们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其实这么做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说因信息不对称不能引起讨论研究,后来者就不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六

研究未来走向有些属于预测性质,有些属于自己理想化的表达。我想在这里强调指出,中国竞技体育的成功有目共睹,无可否认。存在决定意识,我不主张用现在的观点批评过去否定过去,过去有过去的时代背景,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看过去的许多事情。